

# 子女性别和孩次对中国农村 代际货币转移的影响

周 律 陈 功 王振华  
(北京大学 人口研究所 北京 100871)

**【摘要】**代际转移动机对公共项目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货币转移则是代际转移的重要和常见形式。国内对于子女性别和孩次对代际转移影响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通过采用利他主义和交换假说两种理论模型来定义代际转移动机,从农村地区父母的视角分析子女性别、孩次对代际转移动机的影响。结果显示,子女的孩次对代际转移动机有显著的影响,而子女性别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考虑农村地区子女的孩次对代际货币转移的影响,从而提高公共资源的效用。

**【关键词】**农村; 子女性别; 孩次; 代际转移; 货币转移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4-129X.2012.01.006

**【文章编号】** 1004-129X(2012)01-0052-09

**【收稿日期】** 2011-10-25

**【作者简介】** 周 律(1980-),男,北京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后。

陈 功(1972-),男,湖北孝感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振华(1987-),男,河北承德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 一、前言

货币代际转移(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一直是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社会工作者感兴趣的话题。货币转移包括货币、实物、不动产的转移。两代人之间资源转移有两种基本的形式:父母流向成年的子女(向下转移)和子女流向年老的父母(向上转移)。从政策角度看,向上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代表了老年人最重要的安全网络。<sup>[1]</sup>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09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达到了1.67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2.5%。老年人口总数仍在上升,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亿,占到中国总人口的16.7%。<sup>[2]</sup>中国绝大多数老年人生活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2006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农村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估计有1.08亿(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0%以上)。农村老年人年均收入约为2970元(约合434美元),仅为城市老年人收入的1/4。由于收入低及缺乏养老金体系的保障,尤其在国家支持与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形下,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比较

困难。<sup>[3-4]</sup>

在农村地区,政府仅为老年人提供很少的资源,家庭的支持与个人的积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政府也认为农村家庭应该照料老年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力更生与家庭养老具有悠久的历史。许多农村老年人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其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探索农村地区私人代际转移的动机以及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与制定针对农村老年人的公共政策、改善其经济生活状况密切相关。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私人代际转移可能会被公共援助所代替。因此,政府援助可能带来私人转移的减少。但是,增加公共援助如何影响私人货币转移,很大程度取决于代际之间经济交换的动机。然而,目前中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是空白。

了解促使子女向父母转移资源的因素对中国和其他类似传统文化的国家非常重要,因为未来的社会保障与政府救助的规模需要以此来确定。如果子女减少转移支付的量与老年人从国家新政策中获得的量相等,那么即使政府的支出增加,老年人的社会净收益仍不变。相反,如果老年人不论是否获得政府额外的收入,仍能继续获得子女的代际转移,在此情况下,政府同样的支出才会使老年人的净福利增加。

以前的研究表明,子女的性别与孩次(Birth Order)在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儿子及其家庭通常会给父母提供更多的货币转移,年长的子女也会比其他子女提供的更多。<sup>[5-7]</sup>但是从老年人的角度看,是否真的也是这样呢?换句话说,老年人是否期望从儿子或年长的子女处获得更多的回报?

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至少农业人口是如此。同时,中国的老年人口绝对数量也是世界上最多的。政府的任何新的公共收入转移政策都必然是一笔巨大的支出,甚至超过当前政府的财政能力范围。因此,如果子女的性别与孩次确实是代际转移动机的决定性变量,那么政府可据此制定一些奖惩措施,一方面可以节约资源,另一方面还可以切实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 二、研究方法

### 1. 研究对象

数据来源于巢湖地区。该地区坐落在长江北岸、安徽省中部,拥有14.1万人口。该地区老年人口密度相对高(60岁及以上人口占12%),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外迁到邻近城市如合肥、南京、上海的比例较高。

调查采用分层多级法,随机选择了1800名潜在应答者。首先,从126个巢湖乡镇中随机选取12个。然后,从每个乡镇中随机选取6个行政村。每个村中根据年龄将所有60岁及以上的人口分成两个抽样框:(a)60~74岁的人口;(b)75岁及以上的人口,针对75岁以上人口有意采取了过抽样。

基期调查于2001年4月开始进行,样本包括1715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培训的调查员于2003年10月和2006年12月进行了跟踪调查,受访者分别为1391人和1067人。调查采用测量性能经过验证的结构性问卷,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为保证对问卷进行普通话翻译的准确性,采用了标准的回译法。调查评估了农村老年人在家庭关系、代际转移、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情况。

第四次数据收集于2009年6月进行,共有1224名受访者。与前三次调查相同,受访者需回答6个问题(认知测试,如基本的数学计算、基于阴历的当年的生肖),满分为9分。任何得分低于5分者,将从研究中剔除。排除此类受访者后,目前研究的样本量为1165人。

## 2. 理论模型及操作方法

### (1) 理论模型

本研究调查了获得正向货币转移的老年人的代际转移动机,并分析了影响转移规模的因素。随后从孩次和性别的角度对转移动机进行比较。

下面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 Probit 回归模型被用作研究转移的规模:

$$TM_i = c_0 + c_1 \times RI_i + c_2 \times DI_i + c_3 \times Z_i + e_i$$

其中  $c_0$  是截距  $c_1, c_2, c_3$  分别是  $RI_i, DI_i, Z_i$  的回归系数。 $TM_i$ (货币转移)是货币转移的规模  $RI_i$  是接受者的收入(老年人的收入水平)  $DI_i$  是捐赠者的收入(成年子女的收入水平)  $Z_i$  是代表老年人特征的向量(如人口学变量和其他影响代际转移的因素)  $e_i$  是误差项。

$c_1$  是重要的系数: 负的  $c_1$  与利他和交换假说相一致, 如果  $c_1$  是正的则拒绝利他主义是转移的主要动机, 因为它意味着老年人的收入越高, 得到的转移越多。或者正的  $c_1$  仅简单地反映一个事实, 收入高的捐赠者与收入高的接受者有关系, 因此向他们的亲戚大量地转移(与动机相独立)。因为捐赠者收入和转移量的正相关关系, 捐赠者收入系数( $c_2$ ) 在任何案例中都应当是正的。

### (2) 研究假设

假设 1: 对于年长的子女来说  $c_1$  和  $c_2$  都是正的, 而且显著, 支持交换理论。

假设 2: 对于年幼的子女来说  $c_1$  是负的  $c_2$  是正的, 支持利他理论。

假设 3: 对于儿子  $c_1$  和  $c_2$  都是正的, 而且显著, 支持交换理论。

假设 4: 对于女儿  $c_1$  是负的  $c_2$  是正的, 支持利他理论。

### (3) 操作方法

因变量: 货币转移( $TM_i$ ) 是基于父母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从每一个子女处获得的货币总量。受访者(父母) 首先被问及货币转移的确切金额; 如果不能给出确切的数字, 可从以下分类中进行选择: 0 = 小于 50RMB, 1 = 50 ~ 99, 2 = 100 ~ 199, 3 = 200 ~ 499, 4 = 500 ~ 999, 5 = 1 000 ~ 2 999, 6 = 3 000 ~ 4 999, 7 = 5 000 ~ 9 999, 8 = 大于 10 000(100 元人民币 = 15 美元)。在分析中, 如果有, 研究采用确切金额; 如果没有提供确切的数额, 研究采用每类的中位数。这样, 每个类别相应为 0 = 25, 1 = 75, 2 = 150, 3 = 350, 4 = 750, 5 = 2 000, 6 = 4 000, 7 = 7 500, 8 = 10 000。然后, 在此变量基础上加 1 来获得对数转化值。

自变量: 老年人的特征包括子女数目、性别虚拟变量(1 = 女) 和婚姻状况(1 = 在婚)。年龄按年代测定。收入按照受访者及其配偶工作和退休金的年总收入(+1) 的对数来测量。基于样本中每个组的百分比将此变量编码为 3 个组: 低收入组(0 ~ 22 美元)、中收入组(23 ~ 410 美元) 和高收入组(大于 410 美元)。将中收入组和高收入组设为虚拟变量, 低收入组为基准参考组。老年人早先帮助每个子女照料孙子女将使用虚拟变量来评估(1 = 是, 提供帮助)。

此外,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以健康自评、慢性病数量、功能障碍和抑郁程度为测量指标。老年人健康自评状况通过问题“您认为您自己现在身体健康状况如何”测量。答案分为差到好四级, 分数越高意味着健康自评越差。

慢性病的数量由 12 个条目加总获得。受访者被问及“您是否有下列状况”, 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白内障或青光眼、恶性肿瘤、支气管炎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关节炎或风湿病、胃病如溃疡、骨质疏松、肝胆疾病及其他疾病。得分范围是 0 ~ 12, 分数越高意味着慢性病数量越多。

功能障碍是由 15 个条目加总获得: 基本日常生活活动(穿衣服或脱衣服、室内走动、起床、从椅子上站起来);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做饭、购物、做家务、坐公共汽车或火车、管理资金); 需要力量、活动性和柔韧性的活动(提起 10 公斤重的一袋大米、爬一段楼梯、步行 100 米(约 328 步)、弯腰、下

蹲、曲膝)。应答者指出每项活动的困难程度: 0(没有困难) 1(有些困难) 2(没有帮助无法完成)。该量表的信度为 0.93, 总分为 0(任何活动都没有困难) 到 30(无法完成任何活动)。

问卷中测量心理状况的 9 个问题来自流调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sup>[8]</sup> 根据目标人群进行了调整。3 个条目表示正向情绪(感到快乐, 享受生活, 感到满足) 2 个条目表示负向情绪(感到孤独, 感到心烦) 2 个条目表示边缘化情感(感到无用, 感觉无事可做) 还有 2 个条目表示躯体症状(食欲不振, 睡眠障碍)。按照受访者过去一周内出现相应症状的频度划分为: 0(很少或没有) 1(有时候) 2(大部分时间)。在调整了反向评分题的编码后, 共得出 9 个变量, 抑郁评分为 0~18, 分数越高抑郁出现频度越高。这 9 个条目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 为 0.78。

子女的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孩子数。年龄为进行调查时的年龄。性别(1=女)和婚姻状况(1=在婚)是二分类变量。孩子数是连续变量。收入水平根据问题“您觉得这个孩子的经济状况如何”来测量, 分为四级: 0=很困难, 1=较困难, 2=大致够用, 3=有剩余。对经济状况的总体评价克服了低估的问题。另一个二分类自变量是邻近居住(1=子女居住在同村)。由于样本中共同居住率极低, 因此没有考虑。

另外, 情感亲密度由 3 个评定每个子女与父母关系的问题来测量。问题如下: “综合考虑, 您感觉(与这个孩子)有多亲密”、“当您想要倾诉一下自己的忧虑和难题时, 您觉得(这个孩子)多大程度上会愿意听”、“总体来说, 您和(这个孩子)相处得如何”。这些条目的编码为: 0(一点也不亲密/根本不会/一点也不好) 1(一般亲密/可能/一般好) 2(非常亲密/很大程度/非常好)。将这些条目加总, 得出每个子女的得分, 取值范围为 0~6。用所有子女的总分最高值作为父母该项的得分。这些条目的信度系数为 0.82。

### 三、结论与探讨

#### 1. 描述性分析

样本由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老年人组成, 其中 67% 未接受过任何教育。大多数老年人(94.3%) 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平均年龄是 72 岁(标准差为 8.2), 其中女性占 50.4%。38.5% 的老年人目前为不在婚。平均总收入(每日收入、养老金或退休收入及其他来源的总和) 为 2 672.56 元(393 美元), 58.4% 的老年人没有为晚年储蓄。

受访者在功能障碍方面处于中等水平(均值为 3.87, 最大 30, 标准差为 6.80), 患有慢性病的人数较低(均值为 1.70, 最大 9, 标准差为 1.52)。近一半的老年人(44.9%) 认为其健康状况一般。抑郁水平为轻度(均值为 6.14, 标准差为 3.84)。受访者平均有 4 个存活子女(72.3%)。因此, 本研究从老年人的视角, 对前 4 个子女的代际转移动机进行研究和对比。

96.7% 的老年人在过去 12 个月内得到过至少 1 个子女的货币转移。最年长的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援助最多, 他们中有 78% 的人在过去的 12 个月内给过父母钱(均值为 701.31, 标准差为 1103.30)。相比之下, 第四个子女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只有 46% (均值为 879.15, 标准差为 1579.02)。

#### 2.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分析

##### (1) 子代的货币转移规模和老年人的特征

表 1 显示了老年人分别从 4 个子女处得到的货币数量。对于前 3 个孩子, 接受者包括中等和高等收入的老年人的收入系数( $c_1$ ) 为正且统计显著。给予者的收入系数( $c_2$ ) 也为正, 并且统计显著。

说明利他主义( $c_1 < 0, c_2 > 0$ )不能解释样本中观察到的货币转移模式。

从前 3 个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货币转移看,高收入老年人的系数比中等收入老年人的系数大(见表 1),意味着高收入老年人收到相对更多的货币。根据交换理论的框架( $c_1 > 0, c_2 > 0$ )这个结果说明高收入老年人为孙子女提供照料要求更高的回报,而且因为对老年人提供的这些服务的需求是无弹性的(例如,当子女迁移到大城市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可以照料孩子),因此老年人得到更多的回报。照料孙子女这一变量的系数是正的、且统计显著,证实了老年人照料孙子女是老年人为子女提供一种服务的解释。

然而关于第四个子女的解释却得到了不同的结论。接受者收入的系数( $c_1$ ),包括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老年人,均为负数,并且与货币转移的规模显著相关。给予者的收入系数( $c_2$ )为正,并且统计显著。与利他主义理论相一致( $c_1 < 0, c_2 > 0$ )。

中等收入老年人收入系数的绝对值( $b = 0.02$ )小于高收入老年人( $b = 0.04$ )。第四个子女给收入少的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对于第四个子女,照料孙子女这一变量的系数为正,接近 0,但并不显著。第四个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货币转移不受照料孙子女这一因素影响。

在老年人特征方面,年龄与货币交换规模显著正相关。婚姻状况对货币交换规模有负作用,子女倾向于为不在婚的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子女与父母的情感联系也决定了经济交换规模,关系越亲密,子女给父母的经济支持越多。虽然健康变量(自评健康、功能障碍、慢性病数量、抑郁程度)与因变量负相关,但在回归模型中均不显著。

表 1 2009 年中国安徽省分孩次的货币转移规模与老年人的特征

老年人特征	一孩(N=955)		二孩(N=908)		三孩(N=794)		四孩(N=560)	
	估计系数	t	估计系数	t	估计系数	t	估计系数	t
年龄	.14	2.09*	.04	1.61*	.10	1.48*	.12	1.65*
性别	.02	0.54	.03	0.91	.04	1.11	.04	1.02
婚姻状况	-.02	-0.44*	-.01	-0.14*	-.04	-0.91*	-.02	-0.75*
中等收入组	.09	2.18*	.04	1.01*	.03	1.08*	-.02	-0.29*
高收入组	.11	2.49*	.05	1.01*	.04	1.22*	-.04	-0.69*
自评健康	.01	0.01	.02	0.49	.03	0.65	.03	0.60
功能障碍	.00	0.06	.05	1.16	.07	1.61	.01	0.27
慢性病数量	.05	1.29	.03	0.73	.03	0.67	.08	1.74
抑郁程度	.04	0.98	.02	0.56	.03	0.66	.05	0.92
当前子女数	-.08	-1.26	-.06	-1.66	-.04	-1.00	-.07	-1.41
情感亲密度	.18	5.21*	.21	5.84*	.19	5.09*	.18	4.40*
照料孙子女	.11	2.13*	.04	1.16*	.00	0.10	.00	0.10

注: \*  $p < 0.05$ .

(2) 货币转移的规模与成年子女特征

子女的年龄、性别对货币交换规模有负效应(见表 2)。第一个子女的年龄越大,货币转移的可能性就越小,并且儿子往往比女儿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子女提供最多的经济支持。

邻近居住的系数为负, 表明未同村居住的子女为父母提供较少的经济支持。子女的孩子数量对货币转移的规模有负的影响, 孙子女和祖父母在经济支持上存在相互竞争。

表 2 2009 年中国安徽省分孩次的货币转移规模与成年子女的特征

子女特征	一孩( N = 955)		二孩( N = 908)		三孩( N = 794)		四孩( N = 560)	
	估计系数	t	估计系数	t	估计系数	t	估计系数	t
年龄	-.18	-2.45*	-.13	-1.89*	-.14	-2.00*	-.02	-0.25*
性别	-.09	-2.38*	-.11	-2.86*	-.09	-2.23*	-.14	3.05*
教育程度	.16	4.17*	.16	4.15*	.13	3.14*	.21	4.54*
婚姻状况	.02	0.47	.07	0.14	.04	1.13	.03	0.64
经济状况	.20	5.99*	.18	5.15*	.20	5.29*	.25	5.89*
孩子数	-.09	-2.22*	-.01	-1.66*	-.04	-1.99*	-.03	-1.41*
邻近居住	-.17	-5.12*	-.14	-3.77*	-.10	-2.76*	-.13	-3.06*

注: \* p < 0.05.

### 3. Probit 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表 3 和表 4 总结了多元线性回归和 Probit 回归的结果。证实了假设 1 和假设 2。农村老年人通常对长子的预期回报高于幼子(见表 3)。

用同样的方法来验证假设 3 和假设 4。表 4 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从老年人角度, 性别决定了代际交换的动机这一假设。

### 4. 主要发现

本研究旨在分析中国农村地区子女性别和孩次对代际转移动机的影响以及代际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农村的家庭代际转移动机。

#### (1) 孩次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

孩次与代际转移动机之间关系的假设, 至少从父母的角度支持该假设。研究结果支持假设 1 和假设 2: 农村老年人对年长的子女的抚养符合交换理论, 对于幼子的支持则符合利他理论。即父母期望从年长的子女处获得支持, 作为以往时间投资的回报, 例如照料孙子女(交换), 而对幼子的这种期望较低(利他)。老年人的收入和子女的经济状况的回归系数显示, 对第一和第二个子女是显著的, 但对第三个子女并不显著。这表明,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支持很大程度上依赖年长的子女, 特别是第一个子女, 对第三个子女的期望较少。第四个子女, 通常是最小的一个, 最不可能为父母提供照料。而事实

表 3 分孩次的代际货币转移和时间转移的动机

变量	子女			
	一孩	二孩	三孩	四孩
货币转移				
老年人的收入( $c_1$ )				
老年人中等收入组	.09*	.04*	.03*	-.02*
老年人高收入组	.11*	.05*	.04*	-.04*
子女的经济状况( $c_2$ )	.20*	.18*	.20*	.25*
动机	交换	交换	交换	利他

注:  $c_1$  为老年人的收入系数;  $c_2$  为每个子女的经济状况系数; \* p < 0.05.

上,农村老年人反而为第四个子女无偿提供更多的帮助,这一结果与利他理论相一致。

表 4 分性别的代际货币转移和时间转移的动机

变量	一孩		二孩		三孩		四孩	
	儿子 (N=364)	女儿 (N=435)	儿子 (N=378)	女儿 (N=378)	儿子 (N=309)	女儿 (N=344)	儿子 (N=241)	女儿 (N=230)
货币转移								
老年人的收入 ( $c_1$ )								
老年人中等收入组	.09*	.08*	.04*	.03*	.03*	.02*	-.02*	-.01*
老年人高收入组	.11*	.10*	.05*	.04*	.04*	.03*	-.04*	-.03*
子女的经济状况 ( $c_2$ )	.20*	.19*	.18*	.17*	.20*	.19*	.25*	.23*
动机	交换	交换	交换	交换	交换	交换	利他	利他

注:同表 3。

(2) 子女性别的影响

研究发现,回归结果并不支持假设 3 和假设 4 “农村老年人抚养儿子的动机符合交换理论;而支持女儿的动机符合利他理论(见表 4)”的观点。从父母的角度看,代际交换的动机没有性别差异。老年人对代际转移的期望只与孩次有关,与性别无关。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可能受到农村妇女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的挑战(至少在收集数据的安徽省是这样)。现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已有所减轻,因为妇女被赋予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利益、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本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对儿子和女儿有相同的期望。这表明农村地区女孩的状况可能有所改善。

(3) 代际货币转移的影响因素

对于年长的 3 个子女,高收入老年人的系数高于中低收入老年人(见表 1),说明前者接受了较多的货币转移。根据交换理论,货币转移可以作为父母照料孙子女或者提供其他服务的交换。然而,最小的子女往往为低收入的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这与利他理论相一致。

所有的健康变量(自评健康、功能障碍、慢性病数量、抑郁程度)虽然与货币转移的规模呈正相关,但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这与现有的文献相矛盾。为此有一个可能的解释。首先,研究样本以相对健康的农村老年人作为对照组,受访者为轻度到中度的功能障碍( $M=3.87, SD=6.80$ ),慢性病的数量( $M=1.70, SD=1.52$ )较少,近半数老年人(44.9%)认为自己健康状况“一般”,只有很轻微的抑郁( $M=6.14, SD=3.84$ )。其次,研究结果表明,货币转移的规模主要取决于子女自身的能力,而不是父母的健康状况。子女经济状况的回归系数为正证实了这一观点。子女的年龄和性别与货币转移的规模呈负相关。当子女迁移到大城市后,转移规模往往更高。

(4) 子女的数量

子女的数量与货币转移无显著联系,但是系数为负,与现有文献一致。

Checkovich 和 Stern 的研究显示兄弟姐妹提供的照料是相关的。<sup>[9]</sup> Engers 和 Stern 发现当女儿提供照料,其他兄弟姐妹提供照料的时间就会相对减少。<sup>[10]</sup> Pezzin, Pollak 和 Schone 在理论上提出了父母的居住安排和相应的照料分配的两阶段博弈,包含了 1 个老年人和 2 个子女。他们发现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和每个子女的照料提供是一个在不同偏好和限制条件下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联的决定。<sup>[11]</sup>

### (5) 情感亲密度

情感亲密度用来评价父代与子代之间的代际关系。代际转移的规模与代际亲密程度有关。在亲密的代际关系中理解代际转移的期望是非常重要的。有研究证实这种关系质量下降时,代际转移的数量就会减少。然而如何给予及接受支持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重要的作用。<sup>[12]</sup>

本研究借用了社会学领域的情感联系的测量方法,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系对货币和时间转移规模有正向影响。根据交换理论,对于最长的3个子女,父母照料孙子女与货币转移的规模呈正相关,迁移在外的子女为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但对第四个子女并未产生影响,来自第四个子女的照料似乎更受利他主义驱使,在此之前提供的照料并未起重要作用。此外,作为最小的子女,本调查进行时可能尚未结婚。

### 5. 对政府政策的启示

研究结果对政策的主要启示是,当子女向父母提供服务、进行代际转移时,旨在促进农村地区老年人福利的社会转移的增加,不仅不会导致私人转移被挤出,事实上可能会增加私人转移的规模。这是因为解释中国农村地区私人转移行为的主导动机是交换理论。因而,子女是一种“战略投资”,或许是农村弱势老年人唯一可以依靠的资源。

子女向父母的货币转移的规模与父母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无关。这可能表明,虽然财政支持对老年人非常重要,但心理支持或精神慰藉更重要。因此,政府仅仅向老年人提供现金支持是不够的,应该建立以县为基础或以村为基础的社会服务体系,以提高弱势老年人的心理完好状态和生活质量。

此外,子女的数量与货币转移的规模并不显著相关。这一发现挑战了农村地区“多子多福”的观念。由于子女往往倾向于和同胞一起承担照顾老年人的重担,拥有的子女多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晚年生活支持。近年来,与不赡养老人相关的法律问题已经凸显。一些农村青年无法履行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有些人自身就是在贫困线以下挣扎,所以赡养父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政府应该发展适合老年人的保障体系,这一体系应根本上基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而不仅仅是儿女的数量。

本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家庭支持机制,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对改善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政府政策或项目的需要。经过多年的试验和实践,社会保障已初步形成。但是,为使社会保障服务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口老龄化将加剧老年养老金体系和医疗支出的压力。同时,城市化的发展使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迫切。

### 【参考文献】

- [1] Sloan F. A., Zhang H. H. & Wang J. S. Upstream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02, 69(2): 363 - 380.
- [2] China Daily News. More Elderly Parents Resort to Courts[Z]. Retrieved May 22 2010.
- [3] Joseph A. E. & Phillips, D. R. Aging in Rural China: Impacts of Increasing Diversity in Family and Community Resources[J]. Journal of Cross - Cultural Gerontology, 1999, 14: 153 - 168.
- [4] Li S., Feldman M. W. & Jin X. Children, Marriage Form, and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The Case of Songzi[J]. Research on Aging 2004, 26: 352 - 384.
- [5] Chen X. Social Support, Social Change, and Psychological Well - being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Does the Type and Source of Support Matter? [Z].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1.
- [6] Lin, I. F., Goldman, N., Weinstein, M., Lin, Y. H., Gorrindo, T., & Seeman, T.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ult Children's Support of Their Parents in Taiwan[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3, 65: 184 - 200.

- [7] Sun R. Old Age Support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from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s Perspectives[J]. *Research on Aging* 2002 24: 337 - 359.
- [8] Radloff L. S. The CES - D Scale: A Self - 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J].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77 1: 385 - 401.
- [9] Checkovich T. J. & Stern S. Shared Caregiving Responsibilities of Adult Siblings with Elderly Parent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2 37: 441 - 478.
- [10] Engers M. & Stern S. Long - term Care and Family Bargaining[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2 43: 73 - 114.
- [11] Pezzin L. E. , Pollak R. A. & Schone B. S. Efficiency in Family Bargaining: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Caregiving Decisions of Adult Children and Disabled Elderly Parents[Z]. Working Paper No. 12358.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6.
- [12] Eggebeen D. J. & Davey A. Do Safety Nets Work? The Role of Anticipated Support in Times of Need[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98 60: 939 - 950.

[责任编辑 王晓璐 韩淞宇]

## Impact of Children's Gender and Birth Order on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Transfer in Rural China

ZHOU Lv ,CHEN Gong ,WANG Zhen - hua

(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Abstrac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motivation has strong impact on public project policy , while economic transfer is an important and common form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There is no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gender and birth order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by now. Altruism and exchange hypotheses are used as two models to define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motivation in this article. And we analyze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gender and birth order on the motivation from rural parents' perspective. The result shows that children's birth order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otivation , and the impact of gender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 ,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birth order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in rural China ,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resources.

**Key Words:** rural , children's gender , birth order ,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 economic transfer